

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

韩建业

摘要：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虽然不是每个流行过彩陶的社会都发展为文明社会，但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历过彩陶时代。究其原因，彩陶时代和前文明社会在经济上基本都以农业为基础，彩陶技术和前文明社会的技术水平恰好相适应，彩陶的功能和前文明社会的社会习俗、宗教观念及艺术风格亦相适应。彩陶可谓是前文明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彩陶时代拓开了文明社会的先河。

关键词：彩陶时代；前文明社会；亚欧大陆

中图分类号：K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1) 06-0141-09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1.06.015

作者简介：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狭义的彩陶，是指在器坯表面绘彩，然后一次性烧成的陶器。在烧好的陶器表面绘彩的一般叫彩绘陶。本文所谓“彩陶时代”指狭义彩陶流行的时代，而“前文明社会”指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见图1）。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本文拟加以分析。

亚欧大陆东半部，仅中国境内有过彩陶时代，^①主体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对应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波及西辽河流域。

1. 肇始期（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浙江的上山文化中就已出现原始彩陶，^②这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如果考虑到长江流域南部和华南地区的陶

收稿日期：2021-01-1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仁湘曾指出：“（中国）彩陶的繁荣期大致是在距今6500—4500年前，延续也有2000年之久，有些学者为了强调彩陶艺术的成就，甚至将这个时段径直称为‘彩陶时代’。”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② 蒋乐平：《义乌桥头遗址（考古进行时）》，《人民日报》2020年1月5日。

器已有 2 万年的历史，则上山彩陶的出现就反而显得姗姗来迟。到了约公元前 6000 年，以钱塘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①和渭河—汉水上游的白家文化^②为代表的东、西两大彩陶系统初步形成，前者多色鲜丽、图案复杂，后者崇尚红褐、点染随意，但基本上都为几何纹和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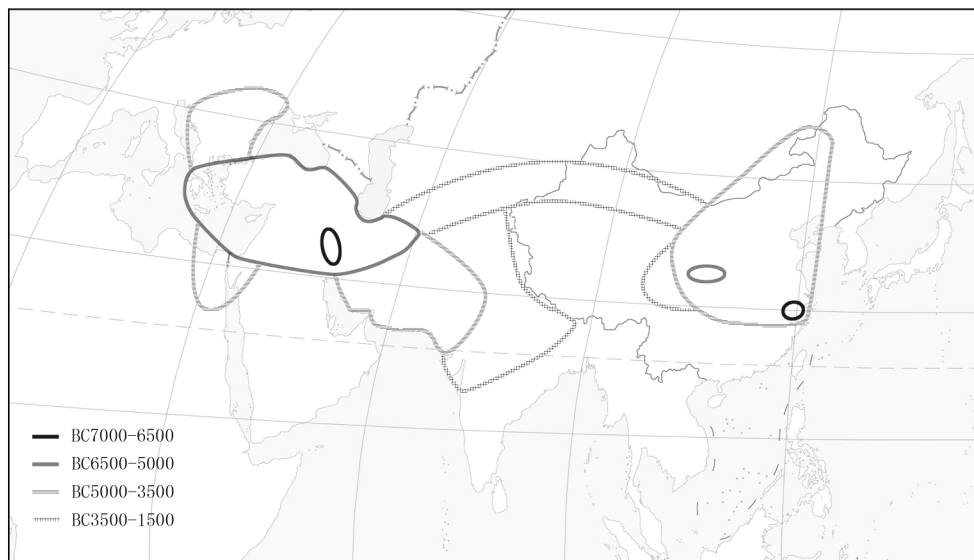


图 1 亚欧大陆不同时期彩陶分布示意图^③

2. 发展期（约公元前 5000—前 4200 年）。基本仍分东、西两大系统，以西系更加发达。西系以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最具代表性，^④ 崇尚黑彩，以直笔几何纹为主，拘谨，舒朗，常见鱼纹、拟人面鱼纹题材；偏东的河北平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则仅有少量简单红彩，并影响到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东系彩陶以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为代表，数量较少，黑或红彩，有四分构图内彩，有的题材略似半坡类型的拟人面鱼纹；^⑤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初期也有少量彩陶，与长江下游存在较多联系。

3. 繁荣期（约公元前 4200—前 3300 年）。西系的弧笔花瓣纹彩陶虽有“一统天下”之势，但东系彩陶因素也向西流播，两系趋于融合。花瓣纹彩陶的中心，在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⑥ 彩陶比例和半坡类型相若，^⑦ 仍主要为黑彩，构图弧笔旋幻，灵动活泼，常见鸟纹。花瓣纹彩陶还大范围流布到整个仰韶文化区，西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南达汉水中游，北到阴山以北；影响则东北至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东至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南达洞庭湖至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⑧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 1994 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的 1:100 000 000 世界地图为底图绘制。

④ 半坡类型彩陶约占全部陶容器的 1.4%—8.83%。参见严文明《半坡类型彩陶的分析》，载《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0—349 页。

⑤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⑦ 庙底沟期彩陶的比例约为 4%—8%。参见张鹏程《仰韶时代彩陶的量化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5 期。

⑧ 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 年第 3 期。

4. 变革期(约公元前3300—前3000年)。东衰西盛,晋南、豫西、关中等仰韶文化核心区彩陶数量逐渐减少,纹样简化,终至基本消失,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已罕见彩陶;仰韶文化边缘地区彩陶仍然较多,并分化为不同的地方风格;^①甘青地区彩陶反而更加发达,纹样繁缛,以至于和仰韶文化有了较大区别,被称为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②

有趣的是,彩陶时代的上述四期,恰好对应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彩陶时代的肇始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期,上山文化晚期和白家文化已有原始农业;“卦画”、太阳、对顶三角、箭镞、×等形状的彩陶符号,或许已具特殊含义,与文字的起源当有关系;白家文化排列较有秩序的“族葬”,体现祖先崇拜、社会秩序和历史记忆。这说明虽然当时尚处于平等社会阶段,但文明要素已经涌现,开始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彩陶时代的发展期或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在半坡类型出现成组布局、门朝中央广场的环壕聚落,^③显示对于向心凝聚社会秩序的强化;^④半坡类型黑彩带钵上有较多刻划符号,后岗类型有蚌塑龙虎墓,^⑤可见记录系统、天文观测、原始宗教进一步发展。彩陶时代的繁荣期或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仰韶文化出现具有军权象征意义的石钺,^⑥纪念碑性的彩陶“鹳鱼钺图”,^⑦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⑧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出现随葬玉石钺等的富有大墓。这显示战争日益频繁,军事首领地位凸显,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迎来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彩陶时代的变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早段,仰韶文化有了秦安大地湾^⑨、巩义双槐树^⑩等大型中心聚落和大型“宫殿式”房屋,崧泽文化出现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墓,^⑪红山文化形成牛河梁大型宗教中心,^⑫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很多区域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半坡类型的直笔彩陶拘谨有序,而社会崇尚秩序和集体主义;庙底沟类型的弧笔彩陶旋幻灵动,而社会趋于分化、崇尚威权。彩陶风格和社会形态也正相吻合。

约公元前30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晚段,除西部地区外,中国大部地区彩陶已基本退出日常生活,彩陶时代结束;残留的个别彩陶,以及相对更多的彩绘陶,主要用于明器、祭器等。这时期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已经明确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阶段,^⑬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也都和良渚文化相仿,西辽河流域社会则全面衰落。

①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② 严文明:《马家窑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71页;谢端琚:《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文物》1981年第4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⑤ 张光直:《濮阳三躄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西峡老坟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⑦ 严文明认为河南汝州阎村“伊川缸”上的“鹳鱼石斧图”或“鹳鱼钺图”,可能是白鹳氏族战胜鲢鱼氏族的“具历史意义的图画”。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

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白水县文物旅游局:《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2期。

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⑩ 《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揭开五千年前“河洛古国”神秘面纱》,《光明日报》2020年5月8日。

⑪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⑫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⑬ 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英]科林·伦福儒、刘斌、陈明辉等:《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约公元前3000年后，西部甘青宁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更加发达，^①一枝独秀，经历了马家窑、半山、马厂等不同阶段，^②影响扩展到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和新疆东部，并与克什米尔和中亚南部等地互动交流，形成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③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在甘青和新疆还存在许多包含彩陶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西部地区这些彩陶文化的社会，虽然存在一定的贫富分化，有的墓葬随葬上百件陶器，但并未出现大型中心聚落和王权，社会分化程度有限，基本都属于前文明社会。

二

亚洲大陆西半部，最先在西亚开始出现和流行彩陶，彩陶时代的主体在大约公元前68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主要对应有陶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大致也可分为四个时期。和中国相比，西亚的早期彩陶产生以后，短时期内就比较发达，可谓后来居上。

1. 肇始期（约公元前6800—前6500年）。西亚虽然迟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但在约公元前6800年以后，扎格罗斯山地和迪兹河流域的古兰（Gulan）^④、乔加·博努特（Chogha Bonut）^⑤、耶莫（Jarmo）^⑥、萨腊卜（Sarab）^⑦等遗址便有了原始彩陶，主要为简单的几何纹红、褐彩。^⑧

2. 发展期（约公元前6500—前6000年）。在伊朗西南苏萨地区的古苏西亚那期（Archaic Susiana），两河流域偏早的哈苏纳文化（Hassuna）、萨马拉文化（Samarra），流行各种题材的红、褐、黑色彩陶。古苏西亚那期彩陶直笔拘谨的风格类似半坡类型，但构图却要细密繁缛得多，尤其密集平行的直线、斜线、波线图案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动物、人物形象。^⑨哈苏纳文化彩陶也是直线元素为主，但构图比较疏朗。^⑩萨马拉文化典型彩陶块体元素增加，复杂而充满韵律，活泼多样，四分内彩图案最具代表性，流行各种动物题材，充满旋动意象。^⑪

3. 繁荣期（约公元前6000—前4000年）。伊朗西南的苏西亚那期早、中、晚段和巴昆

① 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无论生活用品还是随葬品，彩陶器占全部陶容器的比例都在50%左右。参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严文明、张万仓《雁儿湾和西坡山瓜》，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页；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③ 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2018年第1期（创刊号）。

④ J. Meldgaard, P. Mortensen, and H. Thrane. Excavations at Tepe Guran, Luristan. *Acta Archaeologica* 34, 1963, pp.98-133; J. Mellaart,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5, pp.50-51.

⑤ A. Alizadeh, *Excavations at the Prehistoric Mound of Chogha Bonut, Khuzestan, Iran: Seasons 1976/77, 1977/78, and 1996*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20),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⑥ R. M. Adams, The Jarmo Stone and Pottery Vessel Industries. I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long the Zagros Flanks*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05), edited by R. J. Braidwood, etc.,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pp.209-232.

⑦ C. C. Lamberg-Karlovsky, J. A. Sabloff, *Ancient Civilization: The Near East and Mesoamerica*, Menlo Park, CA: The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 1979.

⑧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3页。

⑨ P. Delougaz, H. J. Kantor, *Choga Mish Volume 1: The First Five Seasons of Excavations 1961-1971*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01),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6; A. Alizadeh, *Chogha Mish II: The Development of a Prehistoric Regional Center in Lowland Susiana, Southwestern Iran: Final Report on the Last Six Seasons of Excavations 1972-1978*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30),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⑩ S. Lloyd, F. Safar and R. J. Braidwood, Tell Hassuna Excavations by the Iraq Govern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Antiquities in 1943 and 1944,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4, No.4, 1945, pp.255-289; R. M. Munchaev, N. Ya. Merpert, and N. O. Bade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Sinjar Valley, 1980. *Sumer* 43, 1984, pp.32-53; N. Ya. Merpert, The Archaic Phase of the Hassuna Culture. In N. Yoffee, J. J. Clark (eds.), *Early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Northern Iraq*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Arizona, 1993), pp.115-127.

⑪ J. Mellaart,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 (The World of Archaeology Seri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 杨建华：《试论萨马拉文化》，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275页。

(Bakun) 遗存^①、两河流域北部的哈拉夫文化 (Halaf)^②、南部的欧贝德文化 (Ubaid)^③、安纳托利亚的哈奇纳尔遗存 (Hacilar)^④、堪哈桑遗存 (Canhasan)^⑤ 等, 盛行彩陶, 各种大小、直弧、纵横不同的纹样灵活组合, 复杂多变, 弧笔纹样尤其是花瓣纹增多, 仍有较多四分构图的内彩, 出现了仅在肩部装饰徽章式花纹的简化彩陶。其中哈拉夫文化彩陶弧线纹增多, 流行比较写实的飞禽、走兽、人物、植物等题材, 尤以牛头形象最多。哈奇纳尔文化以大色块元素和图案化的兽头 (牛头) 形象最具特色。

4. 衰落期 (约公元前 4000—前 3500 年)。作为西亚核心区的两河流域进入乌鲁克文化前期, 彩陶已很少见。只是有些边缘地区彩陶仍然较多, 如伊朗高原中北部的锡亚尔克三期 (Sialk)^⑥、希萨尔早期 (Hissar)^⑦ 彩陶, 构图纵横相间, 流行成排成列的动物、人物纹样。

西亚彩陶时代的四期, 也大体对应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彩陶时代的肇始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期, 西亚农业和畜牧业初步发展, 流行大乳肥臀的女性雕像和祭室, 出现权杖头、铜器、印章、符号、原始筹码等, 已经孕育着神祇崇拜、权力象征、青铜器、文字、商业等早期西方文明的因素, 开始了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彩陶时代的发展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中期, 两河流域中南部地区有了灌溉农业^⑧和刀、凿等铜工具, 偏早阶段哈苏纳文化的村落有公共陶窑作坊、公共库房和中央广场, 和半坡类型的社会类似; 偏晚阶段在萨马拉文化出现带围墙和“瓮城”的聚落, 高度一致的“品”字形建筑格局, 家庭或家族地位开始凸显, 社会等级出现。彩陶时代的繁荣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 偏早的哈拉夫文化村落内建筑缺乏秩序, 氏族社会趋于解体, 出现跨村落的宗教区,^⑨ 社会复杂化趋势加强, 进入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 偏晚的欧贝德文化等出现大量易于制作的收割工具陶镰, 农业产量迅速提高, 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出现等级差别, 神庙建筑规模不断扩大, 出土石权杖头、泥质筹码、原始的泥版文书等, 可能已经有了兼具神权和世俗权力的酋邦首领, 两河流域南北空前统一。彩陶时代的衰落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出现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农业, 农产量大增; 村镇和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聚落层级增多, 西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乌鲁克横空出世,^⑩ 并向周围急剧扩展影响, 社会大范围整合, 进入高级酋邦社会。至约公元前 3500 年进入乌鲁克文化

① A. Alizadeh, *The Origins of State Organizations in Prehistoric Highland Fars, Southern Iran: Excavations at Tall-Ebakun*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28),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② M. E. L. Mallowan, and J. C. Rose, *Prehistoric Assyria: The Excavations at Tall Arpaichyah*, 19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R. M. Munchaev, N. Ya. Merpert, *Excavations at Yarim Tepe 1972. Sumer* 29, 1973, pp.3-16; I. Hijara. *The Halaf Period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Nabu Publications, 1997.

③ E. A. Speiser, *Excavations at Tepe Gawra 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5; A. J. Tobler, *Excavations at Tepe Gawra 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0; R. A. Carter, Graham Philip (ed.), *Beyond the Ubai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Late Prehistoric Societies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Ancient Oriental Civilization, Number 63),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④ J. Mellaart, *Excavation at Hacilar*, Published for British Institute at Ankar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⑤ D. French, *Canhasan Sites 1, Canhasan I: Stratigraphy and Structures* (BIAA Monograph Series No.23),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1998.

⑥ R. Ghirshman, *Fouilles de Sialk, Près de Kashan*, 1933, 1934, 1937, 2 vols., Musée du Louvre, 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orientales, Série archéologique tome IV, Paul Geuthner, Paris, 1938/1939.

⑦ E. F. Schmidt, *Excavation at Tepe Hissar, Damgh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7.

⑧ J. Oates. Choga Mami, 1967-68: A Preliminary Report, *Iraq* 31, 1969, pp.115-152; H. Helbaek, Samarran Irrigation Agriculture at Choga Mami in Iraq. *Iraq* 34, 1972, pp.35-48.

⑨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166、205-210页。

⑩ J. Schmidt) Uruk-Warka, *Sumer* 33/4de1977: 105-118; H. J. Nissen, *Urukking Großstadt des 4. Jahrtausends v. Chr.*, Seipel-Wieczorek, 1999, pp.189-221; M. Liverani. *Uruk: The First Cit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Z. Bahrani and Marc Van De Mieroop, London: Equinox, 2006.

后期，两河流域发生“城市革命”，出现城邦王权和多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进入文明社会。^①

受西亚的影响，公元前6000多年以后在东南欧、东欧、北非、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也都先后开始出现彩陶。

东欧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Tripolje-Cucuteni）有发达的旋纹、花瓣纹彩陶，^②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近似，流行于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该文化偏晚阶段出现面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但这些聚落是有中央广场的环形向心结构，聚落和房屋都只有大小之别而无功能上的显著差异，尚属于前城市或前文明社会阶段，^③之后逐渐消融于草原畜牧文化当中。

中亚南部彩陶流行于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从早到晚依次为哲通文化（Jeitun，约公元前6000—前4200年）的细密平行线纹彩陶，^④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Anau-Namazga I，约公元前4200—前3500年）的粗犷花瓣纹、折线纹彩陶，^⑤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Namazga II-IV，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的金字塔纹或锯齿纹彩陶。^⑥青铜时代早期的纳马兹加四期有颇具规模的灌溉农业，出现阿尔丁特佩（Altyn-Depe）、萨拉子目（Sarazm）等初期城市。至青铜时代中期的纳马兹加五期以后彩陶消失，进入较为繁荣的绿洲城市文明阶段。^⑦

北非尼罗河流域彩陶时代约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3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涅伽达一期（Naqada I）文化有交叉线纹彩陶，铜石并用时代的涅伽达二期文化有船、树、女人等题材的装饰彩陶。^⑧社会则由氏族社会逐渐演变为拥有众多地方性小国诺姆（Nomes）的前国家社会，再整合成更大范围的初始国家社会。至约公元前3300年以后进入涅伽达三期或者“零王朝”

① 《剑桥古代史》对埃利都（Eridu）陶器和建筑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尽管在埃利都的底层发现的彩陶在艺术上高度发达，设计精巧，但最初的建筑物本身却很简单……而当建筑渐趋精巧，在布局上也更趋标准化时，陶器却丧失了图案丰富的特征，趋向重复，变成类型相对有限的、更加机械而呆板的制品。”参见[英]I. E. S. 爱德华兹（I. E. S. Edwardz），C. J. 嘉德（C. J. Gadd），N. G. L. 哈蒙德（N. G. L. Hammond）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一卷第一分册）：导论与史前史》，汪连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5页。

② V. G. Zbenovic, *Siedlungen der frühen Tripol'e-Kultur zwischen Dneestr und Südlichem Bug*, Verlag Marie Leidorf GmbH, Espelkamp, 1996; C.-M. Lazarovici, G.-C. Lazarovici, and S. Turcanu, *Cucuteni: A Great Civiliz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World*, Palatul Culturii Publishing House, Iasi, 2009.

③ 如乌克兰的Talianki遗址450万平方米，Chicherkozovka遗址300万平方米，Maidanetske遗址270万平方米，Dobrovody遗址250万平方米。V. Kruts, Giant-settlements of Tripolye culture, In Francesco Menotti and Aleksey G. Korvin-Piotrovskiy (eds.) *The Tripolye Culture, Giant-Settlements in Ukrain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xbow Books, 2011: 70-78.

④ В. М. Массон. Поселение Джейтун (проблема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ящ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 180. JL: Наука, 1971; J. Coolidge. Southern Turkmenistan in the Neolithic: A petrographic case stud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423, Archaeopress, Oxford, 2005.

⑤ H. Schmid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Anau and old Merv, in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R. Pumpelly, ed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8; P.L. Kohl, The Namazga Civilization: An Overview, In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M. 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1981, pp.vii-xl.

⑥ L. B. Kircho, G. F. Korobkova and V. M. Masson, *The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of the Eneolithic Population of Altyn-Depe as the Basis of the Rise of an early Urban Civilization*, European House, St.-Petersburg, 2008; V. M. Masson, Translated by Henry N. Michael, *Altyn-Depe*, The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8, pp.84-89.

⑦ A. H. Dani, V. M. Masson(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C.* UNESCO Publishing, Paris, 1992; C. Baumer,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he Age of the Steppe Warrior*, London: Corgo, 2012, pp.60-62.

⑧ D. Arnold, J. Bourriau, and H. Nordström,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ian Pottery*,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3.

所代表的早期国家时期，彩陶基本消失。^①

巴基斯坦西南和印度河流域，在约公元前48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梅尔伽赫（Mehrgarh）三期以后，开始流行动物、植物纹和几何纹彩陶，^②尤以巴基斯坦南部的纳尔（Nal）阶段彩陶最为复杂繁缛、色彩斑斓。至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已经出现卡利邦岗II（Kalibangan）等原初城市社会。^③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进入以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为代表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之后，^④彩陶并未消失，反而更加奢华精美，只是数量减少，或许主要变成宗教祭祀用品。

东南欧爱琴海地区从约公元前6400年以后，就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赛斯科文化（Sesklo）等当中出现折线、三角等直笔几何纹彩陶，后出现旋纹等弧笔彩陶，有了防御设施严密的卫城，步入前文明社会。^⑤例外的是，公元前3千纪至前2千纪的青铜时代，基克拉迪文化（Cycladic）、克里特文明（Crete）和迈锡尼文明（Mycenaean）等仍然流行各种动植物、人物等题材的彩陶，制作愈加精美；公元前1千纪的古希腊彩陶更是精美异常，达到顶峰。^⑥

三

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够大致对应，有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彩陶和前文明社会基本都以农业为基础

农业生产保证了更稳定的定居生活，为彩陶的制作和使用提供了条件；农业促使人口增加、技术进步、社会复杂，是文明起源的必要前提。进一步来说，彩陶和农业都离不开土。彩陶多为泥质陶，所需泥料一般为较细腻的第三纪红土、早期黄土和淤积土，最容易在植被比较稀少的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获得；而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主体为黄土、类黄土以及冲积平原地貌，土壤深厚，水热条件适中，正好适合发展谷物农业。

白家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就主要分布在世界上最大最集中的黄土地区——黄土高原，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制作泥质陶所需的第三纪红土和早期黄土，又有适合粟、黍类旱作农业发展的良好自然条件，粟（黍）作农业保障了该地区彩陶文化数千年的连续发展和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还曾被称为“黄土的儿女”所创造的文化^⑦或者“黄土高原的产儿”。^⑧特里波列

① B. Andelkovic,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Egypt in the Prehistoric Period”, in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ed. Emily Teeter, 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 Publications 33,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pp.25-32.

② C. Jarrige, J.-F. Jarrige, R. H. Meadow, and G. Quivron (eds.), *Mehrgarh: Field Reports 1974-1985, From Neolithic Times to Indus Civilization*,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Karachi, 1995.

③ B. B. Lal. “Kalibangan and Indus Civilization”, In D. R. Agrawal and D. K. Chakrabarti (eds.), *Essays in India Protohistory*, New Delhi: B. R. Publishing, 1979, pp.65-97.

④ J. Marshall etc. (eds.), *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Being an Official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Mohenjo-daro Carried out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22 and 1927*,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31; G. L. Possehl, *The Indus Civilization: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2.

⑤ A. J. B. Wace and M. S. Thompson, *Prehistoric Thess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A. W. R. Whittle, *Europe in the Neolithic: The Creation of New Worlds*, Vol Series: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 W. Bailey, *Balkan Prehistory: Exclusion, Incorpor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⑥ R. M. Cook, *Greek Painted Potte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d edition, 1997; P.A. Mountjoy, *Regional Mycenaean Decorated Pottery*, Rahden/ Westf.: Marie Leidorf, 1999; C. Broodbank, *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 F. Willetts,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 Reprint, New York: Phoenix Press, 2004; T. N. Richard, *Greek Art and Archaeology: A New History, c. 2500-c. 150 B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11.

⑦ J. G.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4.

⑧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165页。

一库库泰尼文化彩陶也基本分布在东欧黄土区，以种植小麦、大麦、黑麦等麦作农业为主。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彩陶则以有丰厚土壤的冲积平原为基础，有比较发达的麦作农业。

（二）彩陶技术和前文明社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由于易熔黏土的易得和制作的简便，陶器自产生之初就作为一种普通的生活用品存在。作为陶器中特殊的种类，彩陶的彩料主要是赤铁矿、锰矿、磁铁矿、石膏等，比一般陶土难寻，却还谈不上珍稀；彩陶多是制作较精细的泥质陶，绘彩更需费心费时，对制作技术的要求比一般陶器要高，但又不像青铜器、玉器那样达到很高的专业化、协作化程度；彩陶陶器本体的颜色多为红色、红褐色、黄色等，一般需要在陶窑中以开放式的氧化焰气氛烧成，但这类陶窑比半封闭式的还原焰陶窑要相对简单。这就决定了彩陶当为人类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陶器制作积累了较多经验之后的产物，但多数情况下还不属于高技术产品，正好与前文明社会阶段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在文明社会形成期前后这段时间，多数地区彩陶趋于衰落或消亡，但表现方式各有不同。就中国境内来说，约公元前3300年，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溪文化晚期、崧泽文化末期—良渚文化早期，在彩陶极度衰落的同时，出现了轮制陶器技术^①、以还原焰烧制灰陶的技术、窑内渗碳烧制黑陶的技术。轮制陶器坯体更加均匀紧致，标准化程度和制陶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灰陶比红陶耐碱性、耐久性更好，黑陶更加坚固，^②烧制灰、黑陶所用的上部变小的半封闭式窑和“饮窑封顶”等方法，技术上更为复杂。这样看来，彩陶的消失和灰、黑陶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技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这些新的制陶技术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风行于大江南北。而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西王类型等，在彩陶衰落的同时并无轮制出现，陶器反而变得更加粗陋，仅能从陶窑结构的变化^③和灰陶的出现看出至少在烧制技术方面发生了革新。

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的情况和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近似。在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的乌鲁克文化前期，彩陶衰落的同时，两河流域开始流行轮制陶器，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的陶器生产，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④尼罗河流域、中亚南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是彩陶消失、轮制陶器流行；印度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彩陶大为减少，轮制陶器流行。与中国境内不同的是，西方这些地区的轮制陶器大部分为红、黄色，少量灰陶也是浅灰、黄灰色，罕见深灰陶和黑陶，可见仍主要采用氧化焰烧陶。例外的是迈锡尼、古希腊文化利用快轮拉坯技术制作彩陶。

（三）彩陶功能和前文明社会相适应

彩陶多数不仅是普通生活用品，而且是“新石器时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⑤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具有比一般陶器更突出的界定社会、愉悦民众的功能。进一步来说，彩陶承载的信息比较笼统和模糊，适合表达某些共同的社会习俗和宗教观念，而不方便传达确切、具体的信息；不

① 李文杰：《关于快轮制陶的新概念、新判断和新理论》，《文物春秋》2016年第4期。

② 李仰松：《从瓦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考古》1959年第5期。

③ 庙底沟类型期的陶窑一般为横穴式，窑室底部周边有一圈火孔，窑室大体为直筒状；火焰水平进入窑室，升温速度较慢，效率较低，形成氧化焰气氛。半坡晚期类型期和庙底沟二期类型期的陶窑变为斜穴式，窑室底部中间部位也开火孔，窑室下小上大；火焰斜向或接近垂直状进入窑室，升温速度加快，效率变高，形成还原焰气氛。参见宋建忠、薛新民《宁家坡陶窑引发的思考》，载《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20页；张明东：《黄河流域先秦陶窑研究》，载《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49页。

④ P. R. S. (Moore)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http://www.cnki.net>

⑤ 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同的彩陶图案和色彩，更容易界定“横向”的或“族”一类的社会空间；^①彩陶艺术的生动绚烂，更适合抒发广大民众的劳动和生活热情。^②这些都正好与相对平等、崇尚集体、充满热情的前文明社会相适应。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以文字来传达宗教、贸易、政治、军事等确切信息，以珍贵物品来界定“纵向”社会空间或强调上层阶级地位，以更奢华铺张的艺术形式来愉悦精英阶级，一定程度上剥夺了非精英阶级的审美权利，彩陶自然就趋于衰落甚至消失了。^③

中国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西方的古苏西亚那期、哈苏纳文化、哲通文化等，彩陶都以拘谨的直笔为主，流行致密的平行线纹，显得规矩有序；每种风格的彩陶分布范围都比较有限，多半只占据大河的一两条支流的范围；社会则崇尚和平、平等、秩序和集体主义。中国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方的苏西亚那期、欧贝德文化、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等，彩陶都以灵动的弧笔为主，各种纹样组合复杂，显得变幻多端；某些风格的彩陶范围大为扩展，如庙底沟式彩陶扩展至大半个中国，^④欧贝德彩陶北扩至几乎整个两河流域；^⑤社会则趋于暴力、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庙底沟时代或者欧贝德时代之后，中国中东部地区以磨光黑陶和玉器等作为强化社会阶级的“礼器”，这个所谓的“玉器时代”^⑥也是文字产生的关键时代。^⑦西亚、埃及、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等地区以青铜器、黄金、青金石等强调上层阶级地位，进入青铜时代，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出现。可见亚欧大陆无论东西，彩陶时代衰落基本都伴随着文明社会兴起。唯一例外的是希腊，精美彩陶和其他珍贵物品一样，成为上流社会追捧的商品和艺术品。

总之，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虽非每个流行过彩陶的社会都发展为文明社会，但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历过彩陶时代。彩陶可谓是前文明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彩陶时代开拓了文明社会的先河。

（责任编辑：陈炜祺）

① 张朋川说：“彩陶艺术是严格的族文化的表现，绝不是陶工个人任意的即兴创作。所以彩陶艺术随着氏族社会的衰亡而接着衰亡。”张朋川：《彩陶艺术纵横谈》，《美术》1983年第8期。

② 李泽厚认为，仰韶彩陶“还没有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动、活泼、纯朴和天真，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林少雄认为，作为女性、母亲象征的彩陶或陶器文化被代表男性、父亲的青铜文化取代，表示整个时代的审美观由崇柔变为崇力，阳刚战胜了阴柔。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③ 杨建华说：“在农业村落时代，彩陶纹饰可能是人群的标志物，到了城市化的乌鲁克时代，地缘组织取代了血缘组织，彩陶这种象征符号已经不再适用了。”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④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⑤ 关于欧贝德扩张的论述，参见 R. A. Carter, Graham Philip (ed.), *Beyond the Ubai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Late Prehistoric Societies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Ancient Oriental Civilization, Number 63),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⑥ 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

⑦ 王晖：《从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